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在二十世纪的发展是有突出贡献与重大影响的，乃是客观的定论。但实际上现在为止，学界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认识尚且不是非常足够，有许多谬误未被理清，许多意义未得阐述，现在来对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做出一个整体性的概括，或许为时尚早。本书是作者早年的作品，冯氏后来的诸多争议，在学术上已经偏离了早年的轨道，虽然还只是初具规模，但本书的学术价值要高于《新编》，这是无疑的。

作者擅于引用西方哲学史的思想家观点来与中国哲学相比较，但作者开篇即点明，全文以西方学术之标准与立场来统领分析，几乎全凭西方为准绳。可以理解如此之便利及当时学术风气之使然，但也必然，不能得中国哲学或者说中国文化之精义全体所在，此又有所失，亦无可奈何矣。下面只就作者在本书中的部分结论，做出厘正，这些观点往往同时又是学界极普遍的误解。

冯氏以为孔子信仰而欲恢复旧制度旧传统，此或不然。孔子“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孔子对周代政治的肯定，但孔子亦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则孔子并非一意好古，亦肯定须有周的后继者，必于周礼有所损益，有所改制。毋宁说孔子欲恢复的不是一模一样的周代文物制度，而是恢复到周代兴盛之时“天下有道”的状态，实有赖于继周之新王也。

作者关于孔子，主要重视其“教育家”的一面，即关注到孔子思想中“内圣”的一端而忽视了“外王”的部分。实际上“内圣外王”实为完整的孔子，故后人既称之“至圣先师”，又名曰“素王”。此为钱穆于《孔子与春秋》中所阐明。汉儒尤其是公羊家尤能注意孔子“外王”的精神所在，虽其说纵有所附会穿凿，毕竟有些大义微言他们确有所受。唐以后，尤其至程朱理学兴起，孔子“外王”的部分也渐渐不为儒家所看重，只以“内圣”为主，则“素王”的精神泯灭了，孔子只在儒家学者中留下了“至圣先师”的印象。作者大概即是步此宋儒之偏见。进而言之，孔子为当时中国文化之集大成者，虽为后人以儒家视之，但影响所在，绝不仅止于儒家。实际上诸子百家言之风气，即为孔子所开创，此点亦中国思想史上极为重要之事，但鲜见有学者论及，更不及详论。如此，则“教育家”更为不能概括孔子之成就与地位。

总的来看，作者除了在文中引用原文之外，基本还是采取西方治哲学史的一般方法，即对学术的传承和哲学先后影响，思想与社会的互相作用，缺省忽略仍旧多矣。而其对古人的错误和歧见，有时也抱有近人之刻薄，略显苛刻，而又有所夸大，此为现代西方视角的偏误；同时对一些思想家的意见的缺陷和消极影响，亦有忽视，此似又陷入中国传统的窠臼中来。作者的有些学术上的看法，也已经不被广泛认可，如二程代表了心学、理学的分野。上述大抵都是作者的缺陷，但依然不能抹煞筚路蓝缕的功绩，而作者在书中亦不乏卓越的看法。其中或许在现在最值得说的，大概是冯氏对中国哲学史的分期。

作者认为，中国实际只有上古与中古哲学，而尚无近古哲学（近现代哲学）。余英时以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而否认冯友兰的看法，但我们却以为，这一观点并不可以认为就是用西方的分期论生搬硬套到中国的情形上，而加以否定。虽然冯氏的分析过程我们未必全然同意，但这个结论，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近代最主要的特点即为科学的突破，西方近代哲学正是在与科学的互相影响中得以实现其发展。既然科学绝非只是西方文化的特征。那么科学与近代哲学的这种关系，也应为中国哲学所有。如此说来，中国哲学尚未进入近代，应为确论。以上只是一些简短而精要的看法，还有许多的问题需留待以后做进一步的申发。